

中共党史专题讲义

●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共党史专题讲义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春华

封面设计：王 岐

中共党史专题讲义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7.75印张 200千字

1989年元月第1版 1989年元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 7-5035-0074-3/D·39

定价：2.40元

CH 18/10

出版说明

一九七七年中共中央党校复校后，校领导十分重视中共党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并且强调了要坚持实事求是、拨乱反正的原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后，党史教研室的教研人员在教学实践中努力研究探索，并吸取了有关同志和学员的意见，在不断改进教学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初具系统的中共党史专题讲义稿。为适应教学的需要，现将这些专题讲义稿整理汇编，按党史的各个历史时期分册出版。

由于我们的理论水平、科研能力和掌握的资料都很有限，因此，本书难免有不少缺点和错误。希望各方面关心中共党史教学和研究的同志不吝批评指正。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

一九八六年九月

107968

D23
5455

ISBN 7-5035-0074-3

D·39 定价：2.40元

目 录

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翁仲二(1)
一、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形势	(1)
二、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7)
三、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方针	(10)
四、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	(15)
东北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	翁仲二(20)
一、向东北进军	(20)
二、东北根据地的创建	(26)
三、东北根据地的巩固	(30)
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	李玲玉(35)
一、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的特点	(37)
二、党的土地政策的演变和土地改革的概况	(39)
三、纠正土地改革中的错误倾向	(53)
四、土地改革政策与策略的发展和完善	(61)
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	翁仲二(71)
一、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的概况	(71)
二、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的特点	(75)
三、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的作用及其经验	(88)
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	翁仲二(92)
一、民主党派的基本情况	(92)
二、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基本政策	(93)
三、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	(98)
解放战争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	李玲玉(110)
一、抗日战争后期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转折	(110)

二、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构思	(114)
三、马歇尔调处及其失败	(119)
四、挽救国民党政权的最后努力	(127)
五、美国对华政策破产的原因	(132)
革命同反革命武装力量的大决战	常东人(135)
一、全面内战爆发前的军事斗争	(135)
二、战略防御阶段的军事斗争	(142)
三、战略进攻阶段的军事斗争	(148)
四、战略决战和追歼残敌阶段的军事斗争	(155)
战略决战的胜利及其重大影响	何 明(133)
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防御及战略 进攻的胜利	(133)
二、战略决战的军事原则	(135)
三、战略决战胜利的重大影响	(139)
将革命进行到底	翁仲二(172)
一、国民党再次发动“和平”攻势	(172)
二、美蒋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	(134)
三、中国共产党粉碎“划江而治”的阴谋， 将革命进行到底	(183)
新中国的筹建	李玲玉(195)
一、创建新中国的理论和政策准备	(193)
二、为新中国的诞生创造条件	(203)
三、新政协的筹备、召开和新中国的诞生	(208)
四、新政协的成功经验	(213)
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的总结	肖一平(217)
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在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取得的	(217)
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经验	(222)
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国际意义	(239)

中国共产党 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翁 仲 二

一、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形势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力量，人民民主革命力量得到壮大，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社会主义阵营开始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空前发展，全国人民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迅速提高。所有这些变化，对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取得最后胜利十分有利。但是另一面，当时的形势也极为复杂，在对战后中国革命的问题上，国际国内存在四种不同的力量，各持不同态度，故采取不同的政策。

1. 美国。美国在战争中没有遭到破坏，反而增强了实力。它的工业，特别是与军事有关的重工业，得到了巨大发展。如以1937年至1939年工业产量为100，到1945年，工业生产指数则达到191。1945年农业生产总指数比1933年增长20%，1940年至1945年五年内农业中增加的各种机器的数量，约相当于过去10多年以至30年增加的总量。在各资本主义交战国弄得民穷财尽的形势下，美国却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经济地位得到了提高。1945年美国单独拥有资本主义世界工业产量的60%，黄金储备量的45%。美国垄断组织在大战中掠得巨大超额利润，从1940年到1946年获纯利高达870亿美元。美国总统杜鲁门叫嚣要建立由美国“领导”的“自由世界大家庭”，拟定了“全球战略”，垄断了原子弹，积极

推行战争政策，妄图凭借它的实力，霸占世界。美国到处建立军事基地，1945年，在39个国家中驻扎了大量军队，到1946年，美国已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140多个军事基地，干涉别国内政，剥削和压榨弱小国家，镇压各国人民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成为国际上最大的剥削者和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起着“国际宪兵”的反动作用。

美国从它反革命全球战略出发，认为中国是亚洲的重心，霸占了中国，就控制了亚洲，就可以集中力量向欧洲进攻，从而称霸世界。因此，变中国为它的独占殖民地，这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总战略目标。从这一政策中可以看到：

(1) 这是美国对中国的一贯的长期的政策。为了达到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目的，它早就加强对国民党的控制，扩大它的在华势力。从1942年起，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利就开始把中国作为未来“四强之一”，给蒋介石戴上一顶“四强首脑”的桂冠，交换条件是要蒋介石效忠美国。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达成了涉及中国权益的协定，无疑都有美国从中作用。对于这一点，蒋介石自己就供认：“苏美英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的密约，我们中华民国没有参加，在法律上不受其约束，但在事实上，美国对苏和对华政策所加于谈判的影响之大，却无可讳言。”

(2) 美国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用战争的形式，大规模地直接地武装进攻中国是不行的。因为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不要战争，特别是苏联抵抗着美国的侵略政策，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空前强大对美国也是一种牵制。1949年7月，艾奇逊在给杜鲁门的信中自供了这一情况：“共产党却比以往无论什么时候都强盛，整个华北差不多都被他们控制了，从国民党后来所表现的不中用的惨况来看，也许只有靠美国的武力才可以把共产党打跑，对于这样庞大的责任，无论是叫我们的军队在1945年来承担，或者是在以后来承担，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①这就迫使

^①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35页。

美国不是用公开的形式来侵略中国，而是采取了援助蒋介石打内战的侵略形式。这是世界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并不表明美国的当权派杜鲁门、马歇尔不想用战争的形式直接侵略中国。

(3) 美国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就大力支持蒋介石反共。因为共产党是它实现中国殖民地化的最大障碍，而蒋介石必须依靠美国的援助才能发动反革命内战，因此美国就以蒋介石为工具，蒋介石则以美国为靠山，美蒋反动派就在这样的基础上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日本宣布投降后，美国立即出动大批海军陆战队在中国沿海登陆，替蒋介石抢占战略据点和交通线，阻止人民军队接收日军的投降。杜鲁门承认，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的权力只在西南一角，华南和华东仍被日本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就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因此，我们便命令日本人守着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等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并开进海港，我们便将他们送回日本。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①

2. 国民党反动派。日本投降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要从人民手中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要使中国仍旧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它反共反人民的基本政策没有变，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奉行一条原则，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具体表现为：

(1) 大发“接收财”，使官僚资本急剧膨胀。蒋介石派出一批到沦陷区的接收官员，到处抢占洋房、汽车、金条和美女，公开

^① 转引自《中美关系二百年》第119—120页。

侵吞日伪财产。规定200元伪币兑换1元法币，掠夺沦陷区人民的财富。毛泽东曾指出：“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了最高峰”^①。

(2) 美蒋日伪合流，抢夺抗战胜利果实。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垄断了受降的权利，他命令日军在原地“作有效之防御”，等待他来“接收”，如被我占领，还要日军“负责将其收回”；命令他的嫡系部队“加紧作战，积极前进，不要稍有松懈”；命令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原地驻防待命”，不许向敌伪“擅自行动”。美国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命令日本政府和战区日本军队只能向蒋介石军队投降，向蒋介石政府投降，不能向八路军、新四军缴械。为了抢夺胜利果实，蒋介石给一批汉奸头目封官加委，任命上海市的汉奸市长周佛海为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指挥，负责抵抗人民军队的受降，任命汉奸任援道为南京“先遣军总司令”，任命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吴化文、张岗峰、门致中等为蒋介石的第一至六路军“先遣军总司令”。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多次向蒋介石表示“绝对确保”其控制的地区移交给国民党。汉奸头目陈公博、周佛海也表示，要以其36万伪军“警卫”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区，完整地“交还”给蒋介石。这样，蒋介石就收编了50万的伪军，使之充当了抢夺胜利果实的“先遣军”。

(3) 蒋介石借口受降，从其大后方西南、西北调动大批军队向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进逼，准备进行内战。国民党依靠美国海、空军帮助运兵，抢占了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主要城市，控制战略要地和交通线，并进军华北，妄图重新建立起在全国的优势。蒋介石深知东北的重要，认为国民党的命运在东北，丢了东北就不能控制华北，所以蒋介石为了抢占东北，分四路向北进犯。第一路是傅作义，从五原出发，沿平绥路向热察进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7页。

犯，第二路是胡宗南从郓城出发沿同蒲路北犯；第三路是孙连仲从平乡出发沿平汉路北犯；第四路是李品仙从徐州出发，沿津浦路北犯。内战危机开始出现。

尽管蒋介石有实现独裁和消灭共产党的妄想和行动，但在当时要发动全面内战，客观上有很多困难。解放区的强大，大后方人民的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国民党内部一部分人不赞成内战，国民党保存在大后方的数百万军队，要开赴华东、华北和东北内战前线的运输困难，这些都使蒋介石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还来不及立即发动内战。

3. 苏联。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蒙受了重大的战争灾难，但经受了考验，取得了胜利。而在对华政策上，苏联的态度则比较复杂。

(1) 1943年下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蓬勃发展，罗斯福和斯大林就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问题进行了讨论。美国渴望苏联早日参加对日作战。因为据美国联合参谋部估计，在德国投降后，尚需18个月方能打败日本，如果苏联不出兵对日作战，美国要付出伤亡100万人的代价；即使占领日本本土之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仍是一支强大的力量。斯大林提出的条件是恢复1904年在日俄战争中被日本废除的俄国的权利，也就是租借旅顺、大连，租借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承认外蒙独立等。1945年2月4日至11日，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和斯大林讨论了这些条件，在中国没有参加的情况下，达成了涉及中国的主权和利益的秘密协定，即《斯大林元帅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草案》。雅尔塔会议后，苏美双方一致对该协定保密，直到4个月后，美国才决定将秘密协定的内容告诉中国政府。这个秘密协定基本的一面是反对法西斯战争的，但其中关于中国问题的条款，无论从内容还是从签署的方式来看，都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2) 1945年8月14日日本发出乞降照会后，苏联政府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代表苏、中双方，签

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国民党政府同意苏联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大连港国际化、中苏双方共同经营中长铁路等要求。苏联政府同意给中国以道义上的援助和军需品等其他物资的援助(此项援助完全供给国民党政府),并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在中国东北地区,国民党政府可以在苏军控制区,设立行政机构和建立军队,并在军事行动停止后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苏联为什么和国民党反动派缔结条约呢?首先,因为在当时中国共产党相对来讲还是少数,国家机构还没有被承认,而蒋介石国民党有一个被承认的国家机构,因此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苏联政府在外交上只能承认国民党政府。其次,苏联坚持和平,要求环绕它的边界各国不反苏而亲苏,以保证苏联边界之安全。因此,为了中苏友好,同国民党政府缔结条约暂时和平共处还是必要的。在战后保持国际和平环境,对中国人民也是有利的。

(3) 苏联领导人过低估计在抗日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民的力量,过高估计美国和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力量,错误地认为战后的中国只能在蒋介石处于“领袖地位”的条件下实现中国的统一;他们不赞成中国人民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革命斗争直至武装的自卫战争。这种态度,对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不能不带来一定的困难。

4. 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力量经过抗日战争有了很大发展。党员在北伐战争时期不超过6万人,后来大部分被敌人打散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员不超过30万人,后来大部分也被敌人打散了,只剩下几万人;而抗日战争结束后,党员达120余万。特别是经过8年抗战,党已成为一个成熟的、具有武装斗争经验的党,党员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大大提高,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正规军达100万,还有民兵200万,并拥有19块解放区(陕甘宁、晋绥、晋察冀、冀热辽、晋冀豫、冀鲁豫、山东、苏北、苏中、苏南、淮北、淮南、皖中、浙江、广东、琼崖、湘鄂赣、鄂豫皖、河南),人口近1亿。这样一支革命力量的

崛起，极大地影响东方和世界，动摇和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东方的统治。也是中国共产党胜利的基础。

中国人民经过8年抗战的艰苦斗争，迫切地渴望和平民主，休养生息，重建家园，但和平民主不经过斗争是不会顺利实现的。党内一部分同志和人民群众中有许多人怕打内战，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美蒋存在幻想；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发出了“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呼吁，并企图在国共两党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因此，中国共产党要代表人民的利益反对内战，揭露内战阴谋，制止内战的发生。

从上述四个方面，可以看出，抗日战争胜利后形势的显著特点，就是中国人民和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矛盾上升成为主要矛盾，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主张和平、民主、独立与蒋介石国民党为代表的主张内战、独裁、卖国的斗争，成为战后政治风云的主要内容，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选择。

二、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在时局急剧变化的历史关头，由于蒋介石在军事上、政治上还来不及作好立即发动内战的准备，美国也希望在中国出现以容纳共产党人到政府中去作官，来达到解散人民武装的目的，蒋介石就发动和平攻势，从8月14日开始，连发3次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利用谈判，麻痹人民，掩盖准备内战。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去谈判，他就可以嫁祸于人，把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如果去谈判，他想乘机压迫共产党交出军队。

1945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问题。会议根据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决定同

国民党进行谈判，并确定了谈判的方针。8月25日，中央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提出新的历史时期中，全国人民的重大任务是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提出实现和平、民主、团结所必须实施的六项紧急措施，并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团结建国大计。26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

中国共产党认为，开展争取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是必要的，经过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有效的斗争，出现革命和平发展的局面也是有可能的。它的依据是：

(1) 中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党所领导的人民主力，还不能产生一个全国性的民主政府，但又有部分民主政府在党领导下，8年抗战证明，只要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任何强大的帝国主义都可以打倒。当时，国内和平、政治民主、民族独立已成为中国人民的根本愿望，也是全国人民的利益所在。中国共产党作为人民利益最忠实的代表者，必须开展争取和平民主独立的斗争，只要内战一天没有爆发，中国共产党就有责任带领人民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和平，哪怕是暂时的和平也应力争，以利于积蓄革命力量，准备自卫战争。

(2) 早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就决定，只要国民党的政策有所转变，只要他们一旦愿意放弃其错误的现行政策，同意实行民主改革，中国共产党就应该、愿意和他们谈判。

(3) 同国民党谈判，争取和平发展的道路是有可能的。国际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以及革命力量所进行的斗争，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对战争的爆发与延迟起重大的作用。在日本投降前后的一段时间内，苏美英三国都需要国际和平，表示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日益壮大；国民党在取得沪宁等地，接通海外和收缴敌械、收编伪军之后，地位虽比过去加强

了，但内部矛盾很多，困难很大，内战的部署一时难以完成。在内外压力下，内战阴谋可能被抵制，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共产党地位，共产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和平发展的新阶段。

(4) 在一定条件下，争取革命和平发展的道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是有先例的。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胜利后，形成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一个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工农代表苏维埃，一个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事变进程要求政权集中到一方面，或是集中于临时政府，或是集中到苏维埃手中。当时列宁提出了“四月提纲”，在这个提纲中，列宁并没有号召实行起义来推翻当时得到苏维埃信任的临时政府，而是力求用解释的和征集力量的工作来争得苏维埃中的多数，改变苏维埃的政策，经过苏维埃去改变政府的成份和政策，即由议会制共和国过渡到苏维埃共和国的和平地发展革命的方针。布尔什维克党在实践中努力争取这一方针的实现，并同一切违反这个方针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7月，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对临时政府的革命义愤到了极点，自发地开始了一次次的游行示威。布尔什维克本来不支持这个作法，当看到阻止群众游行示威已不可能时，党决定参加游行示威，但目的是为了便于把它变成和平的和有组织的。这时布尔什维克党仍然积极实行和平政策。事态发展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联合资产阶级和自卫军镇压了工人和士兵游行示威之后，又捣毁了《真理报》编辑部，封闭了《真理报》、《士兵真理报》和其他许多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开始解散赤卫队的武装，并颁布了逮捕列宁的命令，布尔什维克党的许多重要活动家也遭逮捕。至此，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代表党提出“革命的和平时期已经结束，不和平的时期，搏斗和爆发的时期已经来到。”^①事实

① 《联共党史》第218页。

证明，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也曾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和平发展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中国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客观上具备的有利条件，决定一方面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力争在和平的条件下实现中国的社会改革，把和平建国作为一种可能争取的前途。另一方面，又告戒全党，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变，也不会变。蒋介石决不会轻易地放弃他的内战、独裁、卖国的方针，即使暂时接受了在和平条件下实行一定的民主改革，也不可能根本改变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因此，全党必须准备走七大所预计的长期迂回曲折的道路。准备迎接新的最大的困难。中国共产党的决定是从实际出发的，是以人民利益为重，识大体，顾大局的正确行动。那种认为，在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发布“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派毛泽东等亲赴重庆谈判的重大决策，是单纯为了揭露蒋介石的和平谈判阴谋并用以教育人民，认为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仅仅是一种策略的认识是不够全面的，也是不完全正确的。

三、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方针

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采取什么样的方针和斗争策略才能取得胜利，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十分重大的问题。在谈判前，蒋介石多次散布“中共无意与政府谈判解决纠纷”，“谈判妥协之决策，已失时效”，想把内战的责任推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中共代表团于28日下午到达重庆，蒋介石即在中午召开秘密会议，确定对策是“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统一不稍迁就”。所谓政治上的“宽容”，就是可以给予一些民主自由的空头许诺，而军事上则用“统一”来取消人民军队，这就是蒋介石的既定方针；国民党还利